



丝路明珠

敦煌



走近敦煌丛书

ZOUJIN DUNHUANG CONGSHU



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

ZHUBIAN CHAI JIANHONG RONG XINJIANG



郑炳林 李军 著

ZHENG BINGLIN LI JUN ZHU



甘肃教育出版社

GANSU JIAOYU CHUBANSHE



走近敦煌丛书

Zoujin Dunhuang Congshu

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

丝路明珠

敦煌

DUNHUANG

郑炳林 李军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丝路明珠——敦煌/郑炳林、李军 著.—兰州：甘
肃教育出版社，2007.12

(走近敦煌丛书/柴剑虹，荣新江主编)

ISBN 978-7-5423-1506-9

I.丝… II.郑… III.敦煌市—概况 IV.K9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 090922 号

策 划：黄 强 薛英昭

责任编辑：冯 莉 王光辉

装帧设计：徐晋林

图片支持：敦煌研究院等

丝路明珠

——敦煌

郑炳林 李 军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375 字数 180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50

ISBN 978-7-5423-1506-9 定价：38.00 元





序

姜林

[姜林按]我一向有一个习惯,我从不把别人用我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拿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我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行为。但现在我想破一次例。我读了大概是出于柴剑虹、荣新江等学友笔下写出的“走近敦煌丛书”序,我读了几遍,觉得即使我自己动手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我就把文章拿过来据为己有,同时又昭告天下,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德的行为。

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曰“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



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读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



莫高窟第 275 窟 交脚弥勒 北凉



目 录

敦煌历史沧桑	1
两汉以前的敦煌	1
两汉时期的敦煌	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12



隋至唐前期的敦煌	24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	35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	44
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	59



丝路明珠





古代都会城市敦煌

交通枢纽

商业都会

军事重镇

敦煌的名胜古迹

敦煌地区的佛教石窟

敦煌地区城池关隘遗迹

敦煌地区的著名自然景观



图版目录

参考文献

69

69

79

92

107

107

135

156

166

169





敦煌历史沧桑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交界之地。同时,它也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代敦煌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敦煌市的范围大,还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设置郡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政权的激烈争夺到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从吐蕃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从西夏政权的统治到元、明、清时期的日渐衰落,可以说各个时代的敦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

两汉以前的敦煌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古人曾有解释。唐代颜师古在为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作注时,曾引用东汉应劭的说法,认为“敦”是“大”的意思,“煌”即“盛”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形容敦煌是一个地广繁盛之地。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从字面意思上看,上述两种解释大同小异。按照这种解释,则“敦煌”一名应当是汉武帝设郡时的汉语命名。但据《史记》及《汉书》的记载,“敦煌”一名的出现远比汉武帝于河西地区设置郡县的时间要早。而在上述诸书的记载中,敦煌多与“祁连”同时出现。“祁连”一词来源于匈奴语,“祁连”,也即“天山”。既然“敦煌”与“祁连”连用,这也就证明“敦煌”并非敦煌郡或敦煌县,而应与“祁连”一样,都是当地土著居民称呼的汉语音译。《史记》和《汉书》中与敦煌相关的记载,多是由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年)从西域返回长安后所带回来的信息转化而来,所以敦煌汉名



的发明者很可能就是张骞。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时就无法考证了,所以应劭便从汉语的字面意思上给予解释。虽然学者对“敦煌”一词的来源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有月氏语音译、匈奴语音译、吐火罗语音译、羌语音译、氏人命名等多种说法,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但现在绝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了“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音译的观点。

早在上古时期,敦煌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敦煌正处于这些古文化分布区内。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疏勒河的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它所处的年代为公元前1600多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朝。遗址中的文物十分丰富,除陶器、石器、铜器、金银器外,还有马、牛、羊、猪等动物的骨骼,而尤其以羊骨最为普遍。火烧沟遗址的这一特征,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羌人、西戎牧羊的记载相吻合。考古发掘表明,火烧沟人的文明程度并不比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落后。从他们已经使用石锄、石磨盘、铜铲、陶器等器物的种类看,他们已经有了分工较细的手工业。而遗址中还有玛瑙珠、海贝和蚌饰,这些均非当地出产,说明他们和外界已有交换关系。他们的社会生活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与外界也有了一定的交换关系。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火烧沟墓葬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非常明显。有的墓葬的随葬品仅有少量的陶器,而有的不仅有数量较多的陶器,往往还伴随着铜器以及金、银、玉器和绿松石珠、玛瑙珠、贝、蚌等。有的墓葬里不仅用大量的牲畜随葬,甚至还出现了人殉。以上证据都显示火烧沟文化和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奴隶社会。

继火烧沟文化而起的是玉门市骊马类型文化。1957年,甘肃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骊马城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说明那时当地的生产力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战国以前敦煌先民的了解还很不充分,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做进一步的补充。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东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西至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而当时的



敦煌地区则主要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区还有塞种胡。

秦朝时期,居住在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的月氏不仅是当地最强大的民族,而且在当时整个北方地区也是最强盛的民族之一。此时生活在北方的匈奴人面临着东有东胡,西有月氏的两难局面。为了取得月氏人的信任,匈奴的头曼单于将太子冒顿送到月氏充当人质。此后,头曼欲废冒顿而立其少子,于是就进攻月氏,希望借月氏人之手除掉冒顿。冒顿盗得月氏好马,才得以逃归匈奴,并最终杀头曼而自立。秦朝末年,月氏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人,乌孙王难兜靡战死,普通民众则大量投奔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逃到匈奴后,被冒顿收养,敦煌遂被月氏所占据。而在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的率领下日益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又趁中原战乱之机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接着在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左右派右贤王大破月氏。两年后,冒顿死,其子继位,是为老上单于。这以后,匈奴对月氏的攻势更加猛烈,月氏王被杀,他的头骨被老上单于制作成饮器。大部分月氏人怀着对匈奴的深仇大恨离开故土,向西逃到伊犁河流域;小部分留下来的就退避到祁连山中。后来,西去的那一部分月氏人就被称为大月氏,留下的称为小月氏。约在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已经长大成人的难兜靡之子昆莫在匈奴支持下,率领所统之部,远袭伊犁河流域。大月氏抵挡不住,除少量人留居原处外,大部人又继续西迁,经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一带),来到妫水(今阿姆河)之畔,在北岸建立王庭,迫使南岸的大夏臣服。妫水流域土地肥饶,环境相对安宁,大月氏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生活方式也逐渐由游牧过渡到农耕。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控制了西域,就连新立的汉王朝也屡次受其侵扰。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领区征收赋税之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着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联结,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两汉时期的敦煌

西汉初年,久经战乱的汉王朝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根本无力对匈奴的侵扰进行有力的反击,所以只好用和亲、赠送财物等方式缓和与匈奴的关系,换取了短暂的和平。但



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边郡，杀掠人民。对此，西汉桓宽所著的《盐铁论》记载道：“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

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日渐富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时的西汉国力充实，而且中央集权也大大加强，汉武帝开始筹划反击匈奴。此时，归降汉朝的匈奴人将匈奴击破月氏并以月氏王之头作为饮酒器具之事汇报给汉朝。汉武帝有攻灭匈奴的雄图大志，听到这个消息，就希望能与月氏取得联系，以便共同夹击匈奴。于是，汉武帝便下诏招募能出使月氏的使者。正在汉政府出任低级官吏的张骞应募出使。

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年），月氏还生活在伊犁河、楚河流域，而匈奴在将月氏逐出河西后，不仅控制了祁连山以北，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东端的大片土地，而且还控制了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南麓，以及原来可能役属于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周围的国家。所以，张骞要出使月氏必须要穿过匈奴的控制区。而张骞与堂邑氏胡奴甘父等人出陇西，途经匈奴领地的过程中，被匈奴俘虏并送至单于王廷。对于汉朝希望联合月氏攻击匈奴的意图，匈奴当然不能接受，单于便质问张骞：“月氏在我们匈奴的北方，汉朝怎么能向他们派遣使节？假设我们想经过汉地出使南越，汉朝能允许我们这么做吗？”于是，匈奴就将张骞等人扣留下来，并将匈奴的女子嫁给张骞。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虽然张骞与胡妻已经有子，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仍然保留着代表汉朝使者身份的节杖。由于留居匈奴的时间渐长，匈奴也就对张骞失去了戒心。张骞趁游牧到匈奴西界之机，率领部属逃离匈奴而继续向月氏进发。经过数十天的艰苦跋涉，张骞到达西域的大宛国。大宛早就听说汉朝的富饶，但苦于匈奴的阻隔而不能和汉朝取得联系。所以，当大宛王见到张骞后喜出望外，便询问他想去什么地方。张骞回答说：“我代表汉朝出使月氏，但是被匈奴所阻隔。现在我从匈奴逃出来，希望大王能派人送我到月氏。如果真的能到达月氏，等我返回汉朝后，汉朝廷一定会送给大王很多财物，以表示感谢。”大宛王于是为张骞等人配备了翻译人员。送张骞等人到达康居后，再由康居派人将他们送到大月氏。

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时间，此时大月氏已在妫水流域定



图1 莫高窟第323窟 张骞出使西域图 初唐

居,而此地土地肥沃,且极少受到外族的入侵,所以已没有报复匈奴的意愿。无奈之下,张骞决定返回汉朝。此时匈奴仍占据着河西走廊地区,张骞想沿着祁连山进入羌中地区以归汉,但在途中再次被匈奴截获。一年之后,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张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一同逃亡归汉。张骞为人宽厚,深得西域胡人爱戴。而张骞所带的堂邑父为胡人,射箭的技艺高超,在逃亡途中食品匮乏的时候,就射禽兽作为食物。最初,张骞出使时,使团有一百余人。经过13年的岁月,唯有张骞和堂邑父两个人得以返回汉朝。虽然张骞此次出使并没有达到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却给汉王朝带回了有关匈奴及西域的丰富情报(图1)。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揭开了抗击匈奴的序幕。在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汉王朝收复了“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进入河西,重创匈奴。就连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也被汉军所获,并作为战利品带回长安。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





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创。他们哀叹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之内连遭两次重创，已不堪支持，而浑邪王和休屠王恐单于怪罪，就派人与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汉朝将军李息联系，希望归附汉朝。李息马上把这个消息上奏给汉武帝。汉武帝开始担心匈奴诈降，随即派霍去病前往迎降。而此时休屠王反悔，所以浑邪王就杀掉休屠王，并收编了他的部众。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率领其部众渡黄河东进，此次匈奴降汉者共四万余众。浑邪王被护送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并封浑邪王及亲信数人为侯，将匈奴部众安置于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

汉武帝对匈奴的用兵，经过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出现了金城、河西以西及南山至盐泽地区“空无匈奴”的局面。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张骞曾向武帝献策说：“现在匈奴刚刚被汉击败，而原来浑邪王所控制的河西地区无人居住。西域的蛮夷通常都爱慕大汉的财物，如果现在用财货贿赂乌孙，招徕他们向东发展，占据浑邪王的故地，与汉朝结为兄弟，他们势必要听从大汉的号令，如此则切断了匈奴的右臂。”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派遣他出使乌孙，可见当时汉王朝还没有向河西徙民屯田的意图。但张骞的计策并未得到乌孙的认同，汉王朝这才于元狩四年(前119年)以后，派官吏和士卒五万多人渡过黄河，在朔方郡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之间开凿渠道并设置屯田，开始为经营河西走廊准备条件。酒泉、张掖地处匈奴与西羌两大族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西羌之反叛与匈奴之勾连有极大的关系，汉武帝为了隔绝西羌和匈奴之间的联系，以制止匈奴势力的卷土重来，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西羌后，同年随即派遣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并设置张掖、酒泉郡。此外，还在上郡、朔方西河设置开田官，派遣士卒60万人防戍屯田，以进一步开发河西。

西汉王朝除希望通过河西走廊西通大夏外，还曾一度欲打通由昆明抵大夏之路。但汉武帝所派遣的柏始昌、吕越人等使团，都在昆明被少数民族所杀，所携带的财物也被抢走。虽然汉武帝曾派遣将军郭昌、卫广等，率领长安附近三辅之地的有罪之人及巴蜀将士数万人前往昆明，以讨伐阻拦汉朝使者的少数民族，并获得胜利。但此后所

派遣的使团,仍然无法顺利通过昆明。而汉王朝正是在由昆明通大夏的计划失败后,才下决心经营由河西走廊通西域诸国道路的。

元封二年(前 109 年),汉武帝遣使经酒泉抵达大夏。元封三年(前 108 年),又派遣赵破奴讨伐西域的姑师国。汉军想要讨伐姑师,就必须首先经过楼兰。赵破奴率轻骑七百余人先攻陷了楼兰王城,俘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同年,武都氏人叛乱,被迁徙酒泉郡。元封四年(前 107 年),王恢以佐赵破奴击楼兰有功,封为皓侯。同年,西汉王朝修筑了自酒泉至玉门的障塞,设置了玉门都尉,完成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军事防御设施。而为了配合李广利讨伐大宛的战争,汉朝在元封五年(前 106 年)至六年(前 105 年)左右,分出酒泉郡一部分设置敦煌郡,分出武威郡一部分设置张掖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西四郡”。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代敦煌郡有六个属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图 2)。敦煌县主要位于党河东西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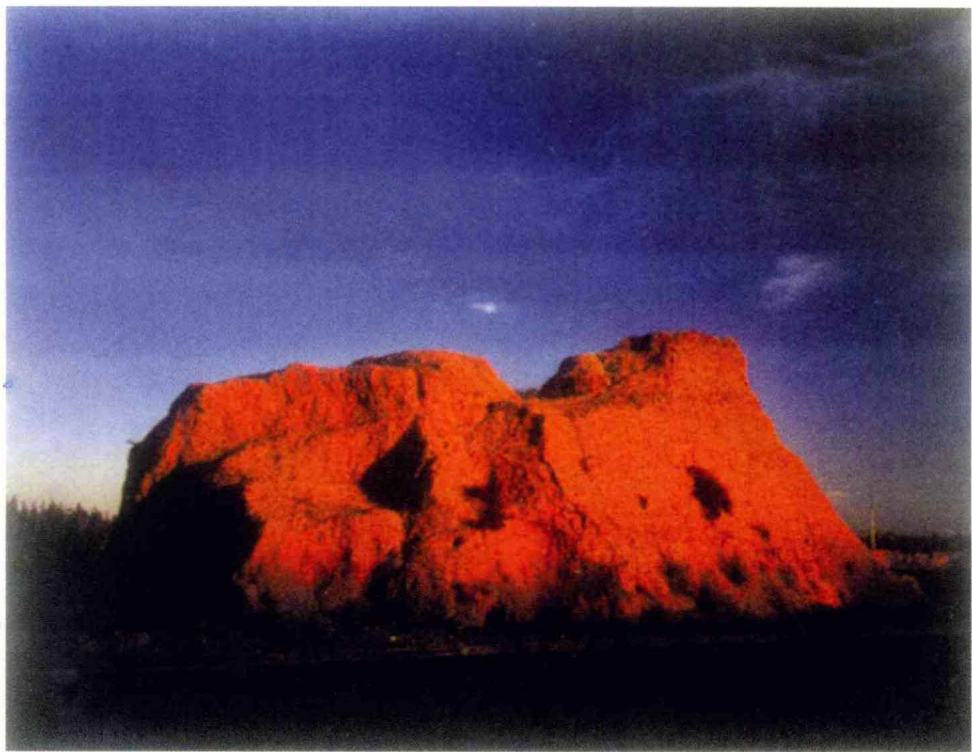


图 2 汉代敦煌古城遗址





的绿洲。敦煌县的西境自大方盘城向东南至今南湖店附近。敦煌县北境为疏勒河，汉朝的行政管辖范围在沿疏勒河南岸所修筑的塞墙以内。东境的界线与今敦煌与瓜州县的分界基本一致。南境在今土尔根达坂山，包括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西部。冥安县主要位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西接广至县境，北至乱山子。效谷县主要分布于今敦煌甜水井北，在西水沟、东水沟和芦草沟下游形成的绿洲上。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的注文，汉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在出任渔泽尉期间，身体力行，劝导民众耕作田地，“以勤效得谷”，使粮食获得丰收，所以，汉政府将此县命名为效谷县。由于人为开发的不合理，加之洪水冲刷和风蚀等原因，这片绿洲今已沦为红柳、沙窝地。其北至汉塞墙，南至三危山，西至宜禾临介燧，东境不明。渊泉县因地多泉水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冥泽以西的诸泉之间的绿洲上。东至冥泽，北至塞墙，西境无考，南境与冥安县相接。广至县，即唐朝的常乐县，主要分布于榆林河下游绿洲（图3）。其东接冥安县，西与效谷县接壤，南抵大雪山，北至汉塞墙。龙勒县主要分布于今南湖绿洲，包括今敦煌县西部和阿克塞哈萨克



图3 汉广至城南垣(邵如林 摄)